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清季宪政大辩论

——《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

彭剑 著

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资助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清季宪政大辩论

——《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

彭 剑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彭剑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37-1

I. ①清… II. ①彭… III. ①宪政运动—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7.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23 号

清季宪政大辩论

——《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

作者:彭 剑 ①

责任编辑:陈良军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4.25

字数:220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4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论战的兴起	(7)
一、创刊	(7)
二、开战	(15)
第二章 双方战将	(25)
一、《中兴日报》作者群	(25)
二、《南洋总汇新报》阵容	(31)
三、笔名是武器	(39)
第三章 文艺类及新闻类文字中的较量	(47)
一、版面设计与报纸栏目	(47)
二、文艺作品中的暗箭明枪	(49)
三、新闻栏中的意识形态	(55)
第四章 孙康两党关于宪政道路之争（上）	(66)
一、根本分歧：君宪还是民宪	(66)
二、关于君主立宪问题的论战	(68)
三、关于革命共和问题的论战	(74)
第五章 孙康两党关于宪政道路之争（下）	(85)
一、关于政党问题的交锋	(85)

二、宪政之路与瓜分危局	(92)
三、关于过去、现实、未来之争	(95)
四、胜败杂谈	(99)
五、复制品的价值	(106)
第六章 孙康两党对清廷宪政的批评与清廷的“发声”	(109)
一、民智与国会	(109)
二、立宪之真假	(116)
三、“反政府”的两种类型	(121)
四、清廷的“发声”	(125)
第七章 华侨对论战的参与	(130)
一、关于“来稿”的几点说明	(130)
二、对孙康两党论战的参与	(135)
三、对“康党—清廷”、“孙党—清廷”两种论战的参与	(140)
第八章 论战与南洋华侨社会	(143)
一、论战前三种政治势力在侨界的博弈与华侨的选择	(143)
二、论战对南洋华侨社会的影响	(153)
结论与分析	(167)
参考文献	(183)
附录：《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之文章目录	(193)
跋	(212)
后 记	(214)

导 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均发刊于新加坡，分别为孙中山一派和康有为一派在南洋的宣传机关。关于孙、康两党之间的论战，是民国以来史学界关注甚多的一个问题，其中特别是两党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研究成果尤其丰富。^① 学界对《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虽已

① 笔者所见第一篇系统研究孙、康两党论战的文章，系高良佐的《开国前革命与君宪之论战》一文（刊登于《建国月刊》第7卷第3期至第8卷第6期上，1932—1933年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的开冰峰著《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1966年）一书，则是研究两党论战的第一部专著。此外，段云章、谭彼岸、黄冠炎的《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华侨中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的斗争》（《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秦如藩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关于要不要推翻清朝民族压迫问题的论战》（《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4期），寺广映雄的《革命瓜分论中的若干问题——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争》（收于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昭和53年（1978年）），张玉法的《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收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7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耿云志的《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等也都是研究两党论战的专题论文，章开沅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人民出版社，1975年）也是研究两党论战的专著，而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也都在相关章节涉及两党的论战问题。以上研究，基本上都围绕《民报》和《新民丛报》展开。

有一定的探讨，但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解读。^① 不过，本书的写作，并不仅仅在于将一个前人关注较少的问题作尽可能细致的梳理。本书的视角，与已有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可别为二。

首先，已有研究成果大都是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的角度来分析清季那场论战，都是从对辛亥革命的影响的角度去探寻论战的意义。本书则不仅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同时还以中国由“秦政”到“宪政”的转轨为背景。

很显然，晚清以降中国在政治领域最显著最具影响力的变化，是君主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化。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政”在这里突然中断，中国政治的运行轨道至此来了一个90度的大拐弯，由“秦政”的轨道折入“宪政”的轨道，实现了一次政治体制的转轨。而在转轨之前，国人对是否应该转轨和应该如何转轨产生过犹疑，发生过争论。这种争论，在国人接触宪政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蒋敦复对宪政的攻击，80年代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的驳难，90年代他们对张之洞的批驳，都是早期值得一书的论辩^②，而康有为等人在甲午战后掀起维新运动高潮之际，主变法者与反变法者之间的论战更加波澜壮阔，是“中国要不要实行宪政”的辩论中最精彩的一幕。当时主张实行宪政者的“天赋人权”论与反对实行宪政者的“天赋君权”论，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③

① 笔者所见关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专题论文，以李恩涵的《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在新、马的思想论战》（《珠海学报》，1987年，第15期）、赵金钰的《革命党与保皇党在新加坡的论战》（《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两文有代表性。另外，多少涉及《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报》论战的著作和论文还有一些，其中尤其是颜清煌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一书，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孙、康两党在新、马论辩的情况。

② 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3、173～188页；许政雄：《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异——以何启、胡礼垣为例》，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四章、附录三。

③ 参见陈鏊：《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收于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七册——维新与保守》，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第165～166页。

在戊戌之后,特别是伴随着清廷“仿行宪政”国策的宣布,国人对于宪政问题的论争,则基本上由“要不要实行宪政”的问题转变为“怎样实行宪政”的问题。在戊戌之前的辩论中,一方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宪政,另一方则认为中国不应该实行宪政。在戊戌之后的辩论中,争论的各方基本上都认可中国要实行宪政,不过有人主张君主立宪,有人主张民主立宪,有人主张仿英立宪,有人主张仿日立宪,有人主张经过一个“预备”时期之后才开国会,有人主张不要“预备”时期而直接召开国会。我们认为,发生在20世纪初孙党和康党机关报上的论战,属于“怎样实行宪政”的辩论的一部分。

可能有人要质疑,孙、康两党机关报上的论战,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的内容,只有民权主义属于宪政的问题,怎么能将两党的论战简单地称为宪政辩论?

的确,从表面看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并列关系,学者们在研究孙、康两党论战的时候,也是将三者并列而论的,三者之中,似乎只有民权主义与宪政相关。不过,如果作深入一点的考察,则会发现,问题并不如表面所见这般简单。

从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来看,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主(民权)主义的一种扩大。人们在国内争取自由,便是民主主义,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争取自由,便发展出民族主义。诚如列宁所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得到印证。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战争把民主宪政的种子播撒于欧洲大地,各国则一方面开始实行宪政,一方面争取民族的自由,反抗拿破仑的统治,民族主义于是高扬起来。^②

就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看,他虽然把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相提并论,并把民族主义摆在民权主义之前,但是,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的,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产生,很有可能比民族主义要早^③,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4页。

②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11~12页。

③ 蒋永敬:《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2页。

而他的民生主义，则是在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①。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三民主义的核心应该是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被摆到民权主义前面，乃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因为排满的民族主义比民权主义更有号召力。

从两党论战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他们将民族、民权、民生并列而举的时候非常多，但是，孙党也常常强调，革命不仅仅是缘于种族的原因，即使是汉人做皇帝，也要实行革命，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② 他们也曾自视为“民主立宪党”。^③ 到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独立，两党的论争也告一段落。两党的相关人员总结过去的论争，更是得出了“其所争之点无他，君主民主之一问题而已”^④ 的结论。由此可见，虽然在论战中关于宪政的辩论常常被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淹没，但是，两党实际上还是认为，他们之间的辩论，核心问题依然是宪政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将孙、康两党的论争纳入宪政辩论的语境中是可行的。

本书的视角与已有成果的第二点不同是，已有成果多在“两派论战”的语境下展开论述，本书则将在“三派相争”的语境里进行言说。

我们认为，在辛亥革命前那场以“怎样实行宪政”为主题的宪政辩论中，论战的参与者实际上有三种政治势力：清政府、康党、孙党。论战形成了三方捉对相抗的局面：孙党—清政府、康党—清政府、孙党—康党。但是，人们在研究这场论战的时候，都只聚焦于孙、康两党的论争，对“孙党—清政府”、“康党—清政府”两对论争则无人关注。本书则不仅关注孙、康两党之间的论战，也关注孙党与清政府、康党与清政府之间的论战。

恐怕有很多人会质疑，清政府与孙党、清政府与康党之间有论

①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289页。

② 绍轩：《满清立宪实成专制》（再续），《中兴日报》，1909年1月16日，第2版；金津：《红衣女子》（八续），《中兴日报》，1908年3月23日，第5版。

③ 夏：《融和汉满之真相》，《中兴日报》，1909年5月5日，第1版。

④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南洋总汇新报》，1911年12月9日，第8版。

战吗？孙党、康党从各自的角度驳论清政府政策的时候虽然很多，但并没有看到清政府的正面回应。

确实，如果把辩论定义为持不同见解的双方正面交锋的话，孙党与清政府、康党与清政府之间的歧见不能称为辩论。不过，就学术界的“习惯”来看，人们对“辩论”的界定并不是如此单一的。比如说，张之洞作《劝学篇》，维护三纲五常的传统，反对民权，何启、胡礼垣作《劝学篇书后》加以驳斥，张之洞对此并没有回应，但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依然把它视为一场辩论。^①又如，独立战争爆发十余年前，针对英国的“新殖民地政策”，北美殖民地人士进行了持久而广泛的攻击。对这一历史现象，学者们冠以“宪政辩论”或“政治辩论”的名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场辩论中，“辩论的一方是反对英国政策的殖民地人士，而代表英国立场的主要不是文字，而是不断出台的政策和措施”^②。这种情形与清季“孙党—清政府”、“康党—清政府”之间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既然学者们可以把北美殖民地人士对英国政府的驳论称为辩论，那么，我们也不妨将辛亥革命前孙、康两党对清政府的驳论称为辩论。

我们希望，本书的研究，不是运用新材料证实旧观点而已，而是能通过视角的转换看到一些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当然，新材料的运用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毕竟对于一个如我这样的初学治史者而言，往往是“占有新材料”，才能“提出新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清季各种势力之间的论辩，不仅仅是为了探讨学理，更是为了影响受众。辩论各方都想说服受众，使之认同自己的“主义”，跟着自己走，支持自己的政治行动。参与辩论的报刊发行地不同，也就意味着受众会有差别，即辩论的影响对象不同。这正是虽然各处论争的内容大同小异，但却仍然值得我们对各处的论争分别细加研究的原因所在。学界关注甚多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发刊于日

① 佐藤慎一著，许政雄译：《一八九〇年代的“民权”论——以张之洞和何启的论争为中心》，收于许政雄著《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异——以何启、胡礼垣为例》，附录三。

② 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74页。

本，其影响的对象以留学日本的华人为主，发生于这两份杂志上的论战，对于我们理解留日学生群体的政治道路选择很有帮助。而本书所探讨的《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其影响的对象以南洋华侨为主，发生于这两种报纸上的论战，则为我们窥探清季华侨群体的政治选择和华侨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正因为如此，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梳理《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展示孙党、康党、清廷对南洋华侨的争夺，并进而揭示这种争夺对南洋华侨社会变迁的影响。